

朱光潜的英诗课

■肖进



朱光潜在教授英诗之外，也追索古今中外诗歌的渊源与关系，注重对诗歌的节奏、韵律和格律的探索。

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中讲述过朱光潜先生一段令人动容的往事：1940年代，朱光潜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，曾为学生讲授英诗。有一天讲到华兹华斯的《玛格丽特的悲苦》(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)，这首诗讲的是一位老妇人，她唯一的儿子外出谋生，七年毫无音讯。诗人隔着沼泽，每夜都听到老人呼唤儿子的声音：Where are you, my beloved son…(你在哪儿啊，我亲爱的儿啊……)齐邦媛说，当朱光潜读到“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…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”(天上的鸟儿有翅膀……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)时，说中国古诗中也有相似的诗句“风云有鸟路，江汉限无梁”，禁不住语带哽咽，读到最后两行：“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, they pity me, and not my grief”(若有人为我叹息，他们怜悯的是我，不是我的悲苦)，“朱先生取下了眼镜，眼泪流下双颊，突然把书合上，快步走出教室，留下满室愕然，却无人开口说话”。这诗人般至情至性的感情表达让齐邦媛感到极为震撼，因为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，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！

其实，如此深入地感受朱光潜先生英诗课的学生，并不止齐邦媛一人，武大教授杨端六的女儿杨静远同样对此记忆深刻。她的《让庐日记》里就有几则与朱光潜的英诗课有关的事。是时杨静远上大二，选修了朱光潜的英诗

课，上课的过程日记中没有细说，但从一开始的接触情况看，英诗课是迷人的。杨静远后来专门追忆这一段时光：“上课铃刚响完，瘦小清瘦却神采奕奕的朱先生面带微笑，快步走进课堂，用他那安徽口音颇重的深沉有力的颤音，向我们开讲英国诗歌……”彼时

的朱光潜45岁，在学生的眼中却因瘦而显得“老”，“我发现，他既不严厉，也不严峻，而是满腔热忱。他的声调，他的眼神，他整个人，散发出一股热流，一种殷切……对于一个渴望开阔眼界，获得美感体验的青年，这是多大的愉快和满足啊”。

但朱光潜也是严格的。杨静远第一学期英诗课成绩仅仅是及格(“丙”)，有的学生只拿到36分。但到第二学期，已经可以看出她在英诗学习上的进步了，得了80分。“像xxx这样的先生，你在他手下得100分也不足为荣，得70分也不足为耻，他

的评价不能做标准，反而你能得到朱光潜先生的80分是无上的荣耀，因为他是真正的学者，他的标准不轻易定的。”妈妈袁昌英的一席话，让杨静远年轻的心灵生发出对真正的学者的敬仰与崇拜。

朱光潜给学生讲授的诗歌，取自于一本叫作《英诗金库》(Golden Treasure)的书，齐邦媛说这本书是“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”，由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。朱光潜偏爱雪莱的《西风颂》《诗人的梦》、济慈的《夜莺颂》《秋颂》、华兹华斯的《致云雀》《致布谷鸟》《水仙》《致雏菊》《致玛格丽特的悲伤》《在西梅桥上》《在海边》……几十年后，年迈的杨静远依然能记起“那掠过长空的云雀的欢歌，溪边金星万点的水仙，鬼魂般纷纷逃逸的晚秋落叶，大海的永恒涛声，辉煌的落日”，这些都随着朱光潜那颤抖的吟诵声，深深植入她的心田。而齐邦媛则饱含深情地说：“朱先生就好像江上的朝阳，仙境般的草野，杜鹃隔河的啼声，年轻的热血全随着他的记忆来了。”

朱光潜在教授英诗之外，也追索古今中外诗歌的渊源与关系，注重对诗歌的节奏、韵律和格律的探索。1943年，他出版了《诗论》，尝试用西方诗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，反过来也用中国诗论来诠释西方诗论。这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颇具开创性的创作。诗论与讲诗，二者相得益彰。

从《列异传·周南》看谣言的“消亡史”

■赵建成

六朝时期，志怪小说繁荣，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著作，如张华的《博物志》、干宝的《搜神记》、陶潜的《搜神后记》、刘义庆的《幽明录》等。这些故事，无论表面上怎样怪诞不经，但其实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揭露，我们一般能够比较容易判断和分析出其社会、历史与文化内涵。但也有例外，如《列异传》之“周南”：

正始中，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，有鼠穴出语曰：“周南，尔某日死。”周南不应。鼠还穴。后至期，更冠幘绛衣出，语曰：“周南，汝日中当死。”又不应。鼠缓入穴，须臾出语曰：“向日适欲中。”鼠入复出，出复入，转更数语如前语。日适中，鼠曰：“周南，汝不应，我复何道？”言绝颠蹶而死，即失衣冠，取视，具如常鼠。(《唐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五十八引作魏文帝《列异传》。又唐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九十五亦引，颇加删略。)

此则内容又见于多种典籍，其较为重要者有《搜神记》《幽明录》(宋李昉《太平广记》卷四百四十引)、沈约《宋书》(卷三十四《五行志》)，文字略有差别，《幽明录》又小有删节。除《列异传》外，其他典籍“冠幘绛衣”皆作“冠幘皂衣”。

“周南”的时代背景设置为魏齐王曹芳正始中，但《列异传》作者又题为魏文帝曹丕，显然矛盾。《列异传》最早著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杂传类，三卷，魏文帝撰。但两《唐志》均题其作者为张华。初、盛唐人皆不云张华，魏文帝说占主流。清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认为《列异传》作者为魏文帝，张华有续书，后人将其合

为一部。此则故事在正始中，则应为张华续书之内容。不过关于作者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，也不影响本文对其内容的分析。

同时，“周南”属志怪小说，不可能实有其事。收录此则故事的类书及相关典籍，在分类时一般都将其归为妖异、神异、妖怪等类，然若仅以妖怪视之，不能得其本旨。沈约《宋书》将其视为“灾祥”，并加以解释说：“案班固说，此黄祥也。是时曹爽秉政，竟为比周，故鼠作变也。”“黄祥”意为预示“灾祥”的黄色物象，然而其内容实在和曹爽专政搭不上边，这种解释殊为牵强，不可凭据。

实际上，与其说“周南”是一则子虚乌有的精怪故事，不如说它是一则富于隐喻性内涵的寓言，这一寓言揭示了谣言产生、传播与消亡的历史，重点在其消亡，具有警示意义。具体而言，故事里的鼠及鼠语象征谣言，鼠死意味着谣言的破灭，而失其衣冠“具如常鼠”，则象征着谣言的外衣已经被剥离，本质已现。

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谣言的定义是：“凭空捏造出来的话；没有事实依据的消息。”事实上，除了无中生有的本质外，谣言的构成一般包括以下若干要素，而这些要素“周南”多已具备：

一是目的性与危害性。谣言的制造和传播往往有很强的目的性，且常会给个体或社会带来危害。在“周南”中，就其情境设置而言，如果周南回应或相信鼠“其某日死”的“预言”，则其必死。就寓意而言，这象征着谣言的得逞，达到了预期的目

的。这是其危害性的体现。

二是重复。谣言若想令人信服，需要重复多遍以强化其可信度，说多了便会乱真。《战国策》里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就是《魏策》中“三人成虎”的故事：接连有三人对魏王说集市上有老虎，魏王的态度也先后由不信转为疑之，进而信之。市本无虎，但三人言而成虎，这就是谣言重复的力量。“周南”中，鼠数次向周南说相似之语，其目的亦在使其信以为真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然而周南对事物有敏锐的判断力，未为其所骗，故鼠“颠蹶而死”，其死则意味着谣言的不攻自破。

三是包装。一般而言，谣言还需要经过包装以强化其可信度。“周南”中，至周南“当死”之日，鼠“更冠幘绛衣出”，场面相当“隆重”。鼠着衣冠，象征着谣言经过包装，这当然更能够使人相信。可惜这次谣言传播的对象是周南，他并未相信，故鼠“颠蹶而死，即失衣冠，取视，具如常鼠”，谣言的外衣被拆穿了。

当然，谣言还有一大特性，即善于利用群体进行传播，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会加以修改和加工，这一点在“周南”中并没有体现出来。

总之，这则小说是以寓言的形式揭示了谣言的产生、传播与消亡的过程。明刘万春《守官漫录》卷五《外编·见闻随笔》“遇怪不言”条在引录此则故事后说：“故今人相戒：遇怪事不得言。又谚语曰：见怪不怪，其怪自坏。”这当然也是一种应对，但仍以怪异视之，没有看到这则小说的本质。其实，从古至今，谣言都一直存在并对

个体与社会造成危害，人们也一直在思考着应对的策略。《荀子·大略》云：“流言灭之，货色远之。”又云：“语曰：流丸止于瓯臾，流言止于知者。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儒者也。是非疑，则度之以远事，验之以近物，参之以平心，流言止焉，恶言死焉。”这里的“流言”即谣言，应予以消除，然而消除谣言只有智者能够胜任，以“远事”“近物”作为判断的依据，识破谣言，则其必不能得逞。这则故事里的周南，就是这样的一位智者，虽然谣言经过巧妙地包装，并且不断在他耳边强化，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见识识破了它，令其消亡。今人也应该像周南一样，对于各种信息，不要盲目相信，更不要加工和传播，而是冷静客观地予以判断。当然，这就需要我们开拓视野，增长见识，增加我们自身的知识储备。

在艺术上，这则小说也颇可称道。开篇，鼠竟能言，违反常理，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。鼠云“周南，尔某日死”，设置悬念，令人更期待下文。“后至期，更冠幘绛衣出”，装模作样，形象滑稽，令人忍俊不禁。周南“又不应。鼠缓入穴，须臾出语曰：‘向日适欲中。’”，“缓”与“须臾”一慢一快，用之甚妙，前者反映出鼠在周南的沉稳面前心理上的动摇，后者则是其内心焦虑的体现。“鼠入复出，出复入，转更数语如前语”，内心的急切更加显然，终致气急败坏，“颠蹶而死”，形象生动，如在目前。与鼠的生动形象相对照，周南则是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智者，他早已洞察一切。总之，整个故事虽然篇幅短小、情节简练，但叙事生动、兴味盎然、引人入胜。